

世界史译丛

SHIJIESHILYICONG

1

山东大学历史系

PDG

目 录

锁国·····	(日)朝尾直弘	谭秉顺译(1)
开国·····	(日)小野正雄	曹淑珍译(21)
五·一五事件—陆军方面公审记录 ·····	周一川译	任明校(39)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日)保阪正康	任明译(42)
伪造中国纸币事件始末 ·····	(日)冈田芳政 曹振庆译	贾悌校(56)
确定西部领土上的土地处理方式立法令·····		(77)
莫瑞尔法·····		(79)
海奇法·····		(81)
	邓红风译 章育才校	
富兰克林·D·罗斯福关于全国产业复兴法 致国会的咨文·····	高建国译	邓红风校(83)
加拿大政体发展史概述·····	宋家珩编译	(86)
商界的圣徒：托马斯·莫尔在伦敦纺织业商会 (英)G. D. 拉姆塞·····	刘明翰译	章育才校(98)
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灭亡的两个文件 ·····	郑群译	章育才校(125)
《罗斯法典简编》·····	刘坤众译	张永全校(131)
封面设计·····		祝明

鎖 国

(日) 朝尾直弘

一、引 言

所谓“锁国”一词

“锁国”在日本语里是把国家封锁起来的意思。

“锁国”一词，是一八〇一年（享和元年）长崎的译员、著名的兰学家志筑忠雄在翻译坎培尔（*Engeldert Kampfer*）所著《日本志》中，以“锁国论”为题，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按照“祖法”，禁止日本人与海外往来。但是，开展了工业革命的俄、美、英等国的船只出没日本沿海，有识之士对幕府的顽固立场采取批评的态度，可是在严厉的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统治的条件下，批评意见是受到压制的。“锁国论”也不能出版，只能偷偷地读到手抄本。“锁国”一词，就是这样从对十九世纪日本状况进行批评的角度产生的。①

日本的近代化，是从培理的舰队来日为转机，把日本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即受到了“开国”的巨大促动，进行了倒幕，继而进行了明治维新。这一事实，必然要在旧体制与“开国进取”的新体制的对比下，而长期保有“锁国保守”这一看法。有人认为，日本受到帝国主义入侵，落后于欧美列强的原因就是

“锁国”；另外也有人认为，由于“锁国”，使日本与欧洲的合理主义精神隔绝，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原因。

“锁国”的实际情形

实施“锁国”的十七世纪，并没有“锁国”一词，也未必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把国家封锁起来。近代历史学探讨了形成“锁国”一词的实际内容，明确地提出“锁国”具有禁止基督教（天主教）和幕府统制贸易两个要素。贸易的数额，在十七世纪“锁国”令以后的一段期间倒有所增长；十分明显，十九世纪时对贸易数额有所限制这是后来才出现的。因此，可以理解为在两个要素中，基本上是以禁止基督教（天主教）为轴心来对抗欧洲势力，从而导致了这一对策与追求贸易利润之间形成了矛盾。二者结合起来，就把禁止日本人出国的“锁国”体制确定为“祖法”。

由德川幕府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与以基督教（天主教）代表的欧洲势力之间的矛盾，形成近代历史学探讨的主要课题，随之种种相应课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从而使“锁国”一词现已在一般群众中间成为普通常识。

近年来的研究动向

近年来，比较史学有了深入研究，对东亚史研究

有所重视，对近世国家形成史（包括德川幕府近世统一权力的国家形成史）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关于“锁国”正是以上述的研究为前提，提出了一些问题。其内容是：日本并没有与欧洲形成直接的对立，日本重视自己为东亚成员之一的东亚世界文化（包括交往形式）；同时，在日本国内，用统一权力使持续了百余年的战乱与分裂得以平息，在平息的过程中，“锁国”应占有一定的位置。可以说，过去天主教、贸易、外交等对外关系史的专家们对“锁国”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在提出的问题则是从国家形成史的角度来加以综合的尝试。

从这一研究的情况以及笔者的立场出发，本文以介绍过去的研究成果为重点（也包括现在提出的问题），试图弄清“锁国”研究的现状。

二、织田、丰臣政权时期（一五六九～一六〇〇年）

澳门——长崎之间贸易的建立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开创了日本近世史。众所周知，成为这一统一权力的重要的财政和经济基础，是富饶的近畿地方和京都、堺等城市，是这些城市商人开发了矿山。

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急剧发展起来的日本银生产，把在亚洲刚刚显露头角的葡萄牙和耶苏教会的势

力，招引到没有其他任何贵重产物的这个小小列岛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明朝正走向衰落，这就使以前所形成的以对明朝纳贡贸易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交往秩序，遭到解体，开辟了私人贸易的时代。

最早来到日本的欧洲人（葡萄牙人），是乘中国人的海盗船漂流到种子岛②，这时带来的火枪很快在国内就能大批生产，对信长的统一战争起了重大作用，这一事实象征着日本这一期间的形势。此后一百年间的日本和欧洲的关系，可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不久，葡萄牙以澳门为根据地，按照明朝政府禁海政策的意图驱逐海盗，以中国生产的生丝和日本生产的白银互相交换为轴心，从事日中之间的中间贸易。从中取得的利益，转为耶稣教会在日本传教的财政来源。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和日本列岛周围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海流和季风），日中之间的贸易，日本方面的贸易基地限定在九州地方。这也是继续了日本对中国、朝鲜交往的传统秩序而制定的办法。葡萄牙人最早的登陆地点是九州，因此他们最初接触的战国大名，则是九州的一些大名。传教士力图首先把九州形成传教的基地，因而在九州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最多。互相对立、争夺的大名，为了获得压倒敌手的武器，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依靠信仰天主教取得传教士带来的枪枝和弹药，因此，不少大名改信天主教。在这种情况下，一五八〇年（天正八年）天主教徒大名大村纯忠，把长崎捐赠给耶稣教会。葡萄牙和耶稣教会取得了确保

日中之间的中间贸易的基地，规定了在澳门与长崎之间进行生丝和白银交易的定期班船的开航，由葡萄牙驻扎在领地果阿的印度总督，对此负责监督。

信长的策略和基督教

在此以前，有一些传教士来到京都，得到足利将军的传教许可。在近畿地方扩大了传教势力。足利（室町）幕府在全国武士团中曾处于栋梁地位，但由于战争和叛乱陷于即将崩溃的状态，在以京都为中心的地区勉强地维持着它的统治。一五七三年（天正六年），织田信长把室町幕府的最后一代将军足利义昭从京都驱逐后，掌握了政权。传教士又从信长那里取得了居住京都传教的许可，耶苏教会和信长的蜜月时代一直持续到信长死去的一五八二年。

织田信长控制了以近畿为中心的本州中枢这一农民武装起义地带，筑成统一政权的基础。这一地区本来是足利幕府和庄园的基地，由于十五世纪后期以来的叛乱（下剋上），当地的实际权力几乎转移到参加“惣”组织的农民手里，城市也趋向市民自治。成为信长最大强敌的是以一向宗（净土真宗）作为联系纽带的农民一向宗起义。他们以拥戴本愿寺而起义，又常常违反本愿寺的意志与武士的统治相对峙。信长在彻底镇压一向宗起义的同时，对惧怕农民叛乱的武士指明统治农民的新策略和应有的态度，鼓舞武士的士气，力图加强统一，确立政权。在这一期间，信长致

力于打倒代表旧体制的旧武士势力——足利幕府，剥夺贵族们（称之为公家，居住在城市的庄园领主和佛教各派别首领）的特权，使之从属于以新武士为中心的政权之下。信长为了推行这一基本路线，利用了能利用的一切，当然基督教也不例外。信长在与佛教各派别的斗争中，为了争取民众，只要认为必要，就与耶苏教传教士合作，以借助其力量；但信长即使允许信仰天主教，并没有认识天主教。信长早已十分清楚的是，在统一战争中枪炮的重要意义。组成洋枪队所表现的军队改革，肯定是信长走向统一途径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种枪炮，主要是在以堺为中心的地区进行生产和调拨的，但是火药和铅完全依赖专门的输入，在输入的途径上，据推测耶苏教会占有更大地位。

秀吉的禁教令

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于一五八七年（天正十五年）征服九州时，发布了第一个禁教令。禁教令严禁基督教的布教和传道，命令传教士离开日本，同时规定只要遵守禁教令，即使是天主教国民，亦可一如既往来日本，允许从事通商贸易。根据禁教令，收回归教会领有的长崎及其周围地区，置于秀吉政权直接统治之下。

关于禁教令的意义，许多研究者有各自见解，一

般认为以全国统一为目标的秀吉，在征服九州诸大名阶段，看到长崎等地成为外国的而且成为宗教领主的领地，引起了对基督教的警惕，这是发布禁教令的直接动机。对于立志于日本统一的秀吉来说，皮肤和发色相异、语言不同的外国领主，阻碍其统一事业，这是不能容忍的。另外，深为信仰基督教的农民，把神社佛阁看作为偶像进行了破坏，从而使他联想到一向宗的信徒曾破坏国内的寺院神社，拒绝缴纳年贡，竟然驱逐武士的领主，创立了“农民掌权的国家”等事实。信长和秀吉的基本策略，是用进行统一的武士力量来统治农民，使之安定守法；对不能执行这一策略的武士，决不宽恕，剥夺其统治身份的资格，所以不允许存在有导致上述危险的天主教徒大名，剥夺著名的天主教徒大名高山右近的大名身份，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基本政策，是与人们厌恶破坏信仰神佛、买卖日本人（买卖奴隶）、吃牛马肉等朴素心理，即萌芽的民族意识相结合，而导致发布禁教令。

秀吉独占贸易及其意义

秀吉于一五八八年（天正十六年）颁布刀狩令，解除了全国农民的武装。同时，又公布了取缔海盗令，命令各大名镇压所属领内的海盗，之后，反复催促这一法令的实施。它是作为继续和保护同葡萄牙船贸易的政策，这就是力图排除走私贸易，把日本方面的贸

易控制在统一政权之下。以后，到了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期，丰臣政权竭力控制着整个九州的外贸贸易，谋求独占以生丝、铅和黄金为主的贸易及其利益。

这种独占贸易的意图，是和惧怕大名的财力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在政策上加紧压制这种力量相联系的。这种独占贸易的意图，并不表明秀吉扬弃了由他统一的日本为基础的国家意识。众所周知，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义满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而为日本国王，和明朝之间开展勘合贸易^③，国内通用的铜钱也都依赖从明朝输入。然而，秀吉自信，只要集结武士势力，依其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旧体制创建新国家；以这一自信为前提，他轻蔑地称明帝国为“大明长袖国”，并为在中国寻求领地实行了军事侵略。“长袖”是长袖衣服的意思，指公卿、僧侣、医生、学者等而言，在武士看来，他们是无力的弱者，是一群脱离了武士的社会伦理而存在的可怜虫。“长袖”是对他们的蔑称。秀吉在被打倒的旧的统治身份背后，发现“长袖”的伦理，看到以支持它的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秀吉没有借用外国的权威，完成了全国统一，成功地实现了封建统治体系的新的国家秩序。国内的财富集中于丰臣政权，以此为资本，铸造金银货币，在货币史上迈出了脱离中国的第一步。另一方面，促使琉球、菲律宾、台湾纳贡等，开展了强硬的外交活

动。这一过程，形成了在东亚旧的国际秩序崩溃的一个侧面；丰臣政权独占贸易则是这一崩溃的重要一环。

圣弗利勃号事件

一五九六年（庆长元年），从马尼拉出航的西班牙船圣弗利勃号漂流到四国的土佐，在对其进行审查时，船员炫耀西班牙帝国领土广大，这就和天主教的传教联系在一起，便发生了不慎的失言事件。以前就有传教乃是领土侵略的前奏这种理解，这一事件成了当局者对传教加深怀疑的决定性因素。秀吉逮捕了传教士和信徒二十六人，押送到长崎，翌年（一五九七年），被处以磔刑。一五八七年的禁教令，由于对贸易的关照和其他因素，并没有严厉施行；至此，秀吉政权谋求传教与贸易分离的姿态，变得明朗了，这一问题加深了矛盾的程度。这是发生在秀吉死去前一年的情况。

三、德川政权的第一个时期——家康时期（一六〇〇～一六一六年）

划时期的一六〇〇年

丰臣秀吉死后，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日本的武士集团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关原进行了决战，东军的德川家康获得了霸权。这就决定了家康及其子孙形成

的德川（江户）幕府，统治了日本长达二百六十余年。家康时期，还不是德川政权完全稳定时期，而是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并对其一一克服的时期。

在与欧洲的关系上，这时发生了一个变化，这就是耶苏教会独占日本传教的局面崩溃了。一六〇〇年库列门斯八世使日本传教向所有修道会开放，八年后，废除了来日本传道的路线限制。早在一五八〇年，葡萄牙被菲立普二世统治的西班牙吞并。另外，一六〇〇年荷兰船利泊特号漂流到日本，从而荷兰船来日载入日本史册。过去有旧教国，现在又有新教国荷兰和英国，为寻求毛织品及其他商品市场往来于日本，与以前的旧教国互相竞争，结果驱逐了先来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日本的势力。统一政权希望传教和贸易分离，与此相应的欧洲势力，在日本出现了。

利泊特号的船员谴责葡萄牙传教士是海盗，德川家康利用审讯利泊特号船员的机会，对欧洲的各种对立势力之间的动向有了大体的认识。船员英国人威廉·亚丹（日本名：三浦按针）和船员荷兰人扬·尤斯坦，很快受到家康的信任，作为亲信参与商谈外交问题。

大御所政治

对家康来说，最大的课题是确保国内统一的问题。他这一时期的努力，是彻底改变秀吉创立起来的丰臣体制，在丰臣体制中家康曾是最高臣僚（五大老的首席大老），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家康以及德川氏为中心

的权力机构。秀吉之子秀赖居住在大阪，领地缩小了，可是在朝廷方面官位的待迁则与家康不相上下，在近畿以西得到丰臣氏恩惠的许多大名当中不少人暗暗地期望秀赖长大成人④。家康在东国确立了势力的基础，一六〇〇年在江户创立了幕府，控制着关东、东北的大名，并占据了八世纪以来即为天皇的居住地、丰臣体制下的首都——京都，家康作为最高的实力者掌握了对内和对外的实权。不久，家康把将军让位给其子秀忠，在京都和江户之间骏府修筑一个城堡，推行大御所政治。

所谓大御所，是对前一将军的称呼，在与朝廷的官职没有关系而独立的这一点上，和秀吉采用的与以前关白相似的太閤一样，表现了实力者的政治。

家康的外交

家康在外交上面临的问题，是修复由于秀吉时代的侵略和对外的强硬方针而恶化了的与东亚各邻国的关系。虽然没有恢复与明朝的邦交，可是和朝鲜的外交关系，由于对马岛大名宗氏的奔走以及家康的诚意，几经周折，于一六七〇年得到恢复，以后逐渐加深了友好关系。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由于家康的努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安南、东京、占城、柬埔寨、暹罗，交趾等国，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婆罗州的婆罗乃，以及摩鹿加群岛、台湾、吕宋等地之间，根据朱印船制度，推进了互相交往。这一制度，规定从

日本到上述地方的船只要持有家康发给的盖有朱印的证件，以证明它不是海盗船，并为保障其航行安全，禁止与非朱印船接触，这就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公家贸易秩序。家康之所以热心于上述的外交活动，可能是想在外交上承认他是日本的主权者，这在国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上会起着有效的作用。

家康的贸易政策

家康即使对在吕宋岛的马尼拉以及所谓遥远的后方基地诺巴·伊斯帕尼亚（墨西哥）分别设有行政机构的西班牙也采取了上述态度：以禁教与贸易分离的方针进行交往。家康为在东国设立与欧洲的接触点，提出在距东京不远的浦贺建立贸易港的计划，可是因日本列岛海岸由南向北流动急湍的暖流，妨碍帆船的自由航行，而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家康于一六〇三年以后任命其心腹为长崎奉行，统辖葡萄牙船运来的生丝的收购和出售，规定生丝和其他商品都有京都、堺、长崎等特定城市的商人团独自承购（丝分配制度）；同时，充当长崎的奉行们，对九州的各大名和商人也进行干涉，奉行本人曾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向葡萄牙船只投资等谋利手段。这些都表现了家康在财力上和军事力量上要超越丰臣氏，并尽力把与天主教各国的贸易掌握在自己手里。家康与荷兰、英国分别在一六〇九年和一六一三年先后建立了邦交，开始了通商贸易；荷英两国的贸易情况，在初期军需品贸易

所占的比重很大。据说荷兰船利泊特号的大炮，在一六〇〇年的战争中，对家康起了作用；十七世纪开头的十年，英国对日贸易的中心是铅，幕府谋求对其独占是显而易见的。输入以铅、大炮、火药为主的武器弹药等，对以经济上、技术上落后的东国为基地的德川幕府来说，是在与丰臣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贸易是它的供应源泉。

加强禁教

家康与新教国建立邦交后，对旧教国的态度就逐渐地强硬起来。虽然把长崎置于直接统治之下，可是基督教徒和耶苏教会在贸易中实际的作用，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特别是东国政权的德川氏，缺少能担负贸易的人材，所以与其说丝分配制度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还不如说它是从经济方面对天主教的一个对策。家康利用与荷兰友好往来的时机，于一六一二年颁布天主教禁令，反复宣布秀吉曾说的：“日本是神国，严禁天主教国带入邪法”，下令消除直辖城市的教会，驱逐传教士，禁止传教，继而决心限制信仰。

第二年，又发布了长篇的禁教令，指明基督教和殖民侵略政策是相互结合的，并发动了全国性的镇压。发布禁教令的背景，一般认为是旧教国和新教国的对立，在日本进行贸易的争夺，三浦按针等的策动。一部分被驱逐的天主教徒投靠了大阪的丰臣秀赖，企图借助其力量，谋求挽回失去的势力。可是经过一六

一四年（庆长十九年）和一六一五年（元和元年）两次大阪的战斗，丰臣氏灭亡，信徒的希望破灭了，从而德川氏的权力获得了稳定的牢固基础。一六一六年家康终结了他的一生。

四、德川政权的第二个时期～秀忠、家光时期（一六一六～一六四一）

禁教和管制贸易的结合

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家康死去四个月后，向大名们发出了值得注意的法令。其内容有三点：第一，进一步取缔天主教，直至对农民教徒必须彻底根除；第二，葡萄牙船和英国船均属基督教船只，故不得在大名领地通商，所有船只仅能在长崎和平户从事贸易；第三，中国船只不受此规定之限制。秀吉时代，禁教的对象是具有武士身份者（领主），农民还不是直接的对象；可是家康把禁教令推广到全体人民。秀忠继承了这一方针，同时让大名领主负责推行禁教令，以期彻底贯彻。从而不仅旧教国就是新教国英国（实际也包括荷兰）也作为管制贸易的对象，并号召警惕所有的基督教——欧洲各国，力图把这些国家的贸易置于德川幕府管制之下。以前曾允许在国内可自由进行商业活动的两个新教国，也规定其商业活动仅限定在长崎和平户两个城市。法令最大的特征，乃是使以前所采取的分隔方针的禁教与管制贸易相结合，

作为统一的法令而公布，以达到强有力的管制贸易的效果。

禁教对德川政权确立的意义

德川幕府所推行的禁教和管制贸易，在其确立统一的一些重要时期中，均作为与其统一事业有密切关联的措施而抛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最初的一六一二年禁教令是在这样情况下公布的：德川氏刚刚在前一年迫使由丰臣秀吉拥立的后阳成天皇退位，使后水尾天皇即位，在权威上超过了丰臣氏，丰臣氏的权威从正统性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德川氏又刚刚对全国主要大名握有镰仓幕府以来的包括治安警察权的最高领导权，并使各大名承认服从这一领导权。一六一六年的法令则是在这样的时期发布的：在前一年丰臣氏灭亡，除掉了未来的祸根，但又是在失去了德川家康这样的高超领导者之后，德川的统治形成制度化，以及巩固和维护统治机构都成为课题。首先，要把以前掌握在骏府大御所家康之下的外交和贸易大权，转移到江户的将军秀忠及其幕僚的手中，使内政外交达到德川权力的一元化，这是对确立统一政权具有的意义之一。其次，应该注意的是，让盟誓服从德川幕府统治权的大名们担负杜绝天主教的责任。这时，认为天主教是从外国遣入的“邪教”，侵犯了日本国。幕府不仅具有统治大名和武士的权限，而对大名领地的农民本来没有直接统治权限，只要根据上述理